

# 我在省立十中(临汝)参加抗日学潮的情况

· 葛洛



我是伊阳(今汝阳县)上店镇人,1920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旧知识分子家庭。叔祖是清末的举人,祖父是秀才,当年是小康之家,到了父辈一代,家境破落。我父亲兄弟三人,分家后,我家只得一分地,父亲、母亲和我三口人守着这仅有的一亩多地过活。因为老一辈都是读书人,在我幼年时期也曾先读过私塾,后来读了小学。1933年高小毕业后,家庭的经济力量不能支持我继续求学,一个年仅13岁的孩子,就开始承担起我家的一部分农业劳动。我从念高小的时候起,就大量阅读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尤其爱读鲁迅的著作。失学之后,在劳动之余,我仍然从母校或同学那里借来书籍杂志,狼吞虎咽地阅读。这些进步书刊尽管给了我许多思想营养,但当时毕竟年纪小,再加并未直接得到革命理论的哺育。因此,每当想到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我只能感到茫然。当然,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竭力争取离开家乡,摆脱这个可诅咒的黑暗世界,到外面广阔的天地去闯荡。而脱离家乡的唯一办法,就是到外地去求学。

到了1935年,我15岁的时候,伊阳开办了简易师范学校,上这个学校不必花多少钱,只要做一身粗布制服,每月背30来斤粮食送给学校厨房,就可以就读了。在我的外姨(小土地出租者)的经济援助下,我的父亲同意我上县师读书。进入县师后,我认识了语文兼美术、音乐教师芦砥若。他刚毕业于开封东岳艺术师范学校,多才多艺,很受我的崇敬。芦老师看到我的学习成绩好,上进心强,对我很器重,两人之间建立了很亲密的师生关系。我常常从他那里借阅新文艺书籍,并且通过交

谈,接受他的进步影响。在我追求光明、探索真理的人生道路上,芦砥若老师是一个给了我很大帮助的人。

1936年暑假,我去投考设立在临汝县(今汝州市)的河南省立第十中学,考得了成绩第一名,取得了助学金和甲等奖学金的待遇,从此就转到省立十中(临汝)读书。

当时,正当抗日战争前夕,全国政治形势正在发生剧烈动荡。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政治觉悟的逐步提高,越来越不安于埋头读书。我进入省立十中不久,十中来了个训育主任徐逸民,此人生活作风朴素,异常严肃,不苟言笑,但我逐渐发现他的思想很激进。他可能也看到我是一个进步青年,便逐步接近我,找我谈话,介绍进步书刊让我阅读。有一天,我在他住房的抽屉里发现一大摞《向导》杂志。当时,我已经知道这是共产党的地下刊物。但徐逸民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我至今仍然不明白。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形成。同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逼近,抗日浪潮在全国兴起。我们十中的30多名学生,在徐逸民的倡导和帮助下,成立了一个时事研究会。我参加该会的组织工作,后来又被大伙推选为会长。我们凑钱订购大量革命和进步书刊。当时,共产党在重庆和延安出版的新书、新刊物,我们都可以购到,其中,如《新华日报》《解放》杂志《群众》杂志以及《统一战线教程》《大众哲学》等,都是我们的重点读物。我们抓紧课余时间阅读这些书报,经常举办学习讨论会,联系当前时局,谈感想,谈认识,学习革命道理,坚定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我从这时起,才开始直接接受马列主义理论,才开始对共产党有了认识。时事研究会的成员们热情都很高,除了组织学习,我们经常利用节假日,组织宣传小分队,到城关镇市上和城郊农村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1936年寒假,大家都不回家,留在学校继续组织学习讨论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起初,迫于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省立十中当局,对于时事研究会的活动采

取置若罔闻的态度。随着政治形势的复杂演变,学校当局好像清醒过来,便对我们的活动进行压制。当时,省立十中有位东北籍的教师,名叫刘去仇,抗日意识强烈,为人耿直,时常在课堂上停止讲课,慷慨激昂地向学生讲抗日义勇军的故事,宣传抗日。他深受同学们的爱戴,学校当局却要解雇他。在他离校赴洛阳的那天清晨,时事研究会的骨干们,把大部分同学动员到学校操场上,要整队为刘老师送行,以表示对校方的抗议。学生队伍走到学校大门口,发现校门已上锁。我和时事研究会的骨干们拿石头砸锁,迫使学校当局派校役把校门打开,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实现了为刘老师送行的计划。事后,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提出了警告。不久,在我的学习成绩单上,我的品行由甲等降为丙等,发给我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也被大大削减。徐逸民据说是校长的好友,他虽然一直没有离开省立十中,但从此就不再公开支持时事研究会的活动了。

到1937年暑假,我感到十中难以待下去。得到一个家庭富裕的同学的资助,我去省城开封,考进了东岳艺术师范学校。可是,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最终无法维持,我在暑假过后不久,从东岳艺师又回到省立临汝十中学习。这时,“七七”事变已经发生,全国处于抗战热潮中,而时事研究会的活动却很难开展起来。在个人生活上,我仅仅得到最低等的助学金和奖学金。有的老师同情我,从石印社拿来讲义稿让我抄写,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一页,只挣得二、三分钱。我写了一些文章和诗寄给外地的报刊发表,得到的稿费也微不足道,因为交不起伙食费,我不能在学校的食堂搭伙,只能零零星星从街头的饮食摊上买东西吃。有一天,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三四个铜板,在一天之内只买了一个馒头和一碗绿豆丸子汤充饥。我本来早已向往延安,现在政治环境这么恶劣,生活又如此困难,我向往延安更加心切,一时却找不到去延安的办法。

1938年暑假,我回到老家伊阳,参加“伊阳县抗敌工作团”,在共产党员刘振东

的领导下,开展抗敌救亡活动。到暑假快要结束时,我投奔延安的想法更加急切。恰在这时,我听说刘振东因事要去西安。于是,我通过芦砥若老师向刘振东提出,希望他把我带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我去延安抗大学习。不久,芦砥若老师转告我说,刘振东答应我去西安。芦砥若老师还按照刘振东的嘱咐,以伊阳县“抗敌工作团”的名义,为我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封介绍信,盖上了工作团的公章,交给了我。8月中旬的一天,我跟随刘振东离开伊阳,途经洛阳到达西安,住在金城旅馆。第二天,刘振东拿着伊阳“抗敌工作团”的介绍信,去找八路军办事处。我想,很可能刘振东事先已把我向八路军作过介绍。因此,办事处同志对我很热情。经过谈话,立即答应我的请求,分配我去抗大六大队去学习。谈妥之后,根据办事处同志约定的日子,我便告别刘振东,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去到八路军办事处,同其他十来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一起,换上八路军军装,被两名带枪的八路军战士护送着,步行六七天,到了抗大六大队。不久,我在抗大入了党。1938年底,我在抗大毕业,满怀希望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组织上却决定我留校工作。1939年初,组织上根据我的愿望,介绍我去鲁艺学习。从此,我便作为党的一名文艺战士,献出了将近一生的岁月。

作者简介:葛洛,男,汉族,现代著名作家。1920年生于汝阳县上店村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1936年考入省立十中(临汝中学),开始接受马列主义。1938年,投奔解放区,入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抗大毕业后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开始了文艺创作生涯。1947年任中原野战军随军记者,1948年在二野政治部任《人民战士》编辑。1953年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诗刊》副主编)。1979年以来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常务书记、《小说选刊》主编等职务。

该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根据葛洛撰写的《伊阳地下党送我赴延安》一文改编而成,题目是编者加的。

## 平语近人

——从用典读懂习近平的执政智慧

###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在要求。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11月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07页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原因之一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针对这一问题,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的要求。总的思路是,按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建立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职责的体制。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11月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07页

国家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行使所有权并进行管理,和国家对国土范围内自然资源行使监管权是不同的,前者是所有权人意义上的权利,后者是管理者意义上的权力。这就需要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和国家自然资源管理者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11月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07页

政府要强化环保、安全等标准的硬约束,对不符合环境标准的企业,要严格执法,该关停的要坚决关停。国有企业要带头保护环境,承担社会责任。要抓紧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相关标准,加大执法力度,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要严惩重罚。要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0日)生态文明领域改革,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目标和方向,但基础性制度建设比较薄弱,形成总体方案需要做些功课。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0日)要抓紧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农产品生产环境的管理,完善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网络,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对受污染严重的耕地、水等,要划定食用农产品生产禁止区域,进行集中修复。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74页



## 风味汝州小吃

### 豆浆

豆浆相传是1900多年前西汉淮南王刘安所发明,很快推广开来,后来也成为老汝州的一种传统饮品。做法是将大豆用水泡涨后磨碎、过滤、煮沸而成。其营养丰富,且易于消化吸收,是一种老少皆宜的营养食品。鲜豆浆四季都可饮用。春秋饮豆浆,滋阴润燥,调和阴阳;夏饮豆浆,消热防暑,生津解渴;冬饮豆

浆,祛寒暖胃,滋养进补。如今,豆浆已成为汝州人的早餐饮品,几乎所有的小吃店早上都有豆浆供应。有诗为证:古城晨醒沐霞光,家家小吃飘香。后生懒起急上班,慌忙驾车买豆浆。寻味线路:市区各早餐点、宾馆早餐供应均可见,各学校附近有多家现磨热豆浆服务。



### 豆沫

豆沫是汝州的一种传统小吃,在汝州城内,有数家摊、店,吸引着本市的和外来的食客。著名作家古龙先生说:天下的小吃,道理大多是一样的,都是以好吃、经济、实惠为主要条件,其中“好吃”一项,自然要列为第一优先。“豆沫这种小吃萦绕在人们心头的,正是它的‘好吃’。”

豆沫起源据传与商代的伯夷和叔齐有关。《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伯夷与叔齐饿死首阳山后,殷都人感其气节,纷纷祭奠,他们把小米放入石臼中舂成粉羹,做成羹,放入青菜和捣碎的黄豆沫儿,呼之为‘豆沫’。传到汝州后,汝州人又增加花生米、豆腐、芝麻、粉条、花椒、八角、芝麻酱等原

料,使之色、香、味俱佳,成为汝州一种风味小吃。上佳的豆沫若观色,呈半透明的乳黄色,佐以红绿色,精致养眼;其香,醇厚的米香,伴着豆香、芝麻香、花生香和蔬菜的清香融为一体,浓郁得扑鼻;边喝边品味,汤味细腻醇厚,配菜香脆嫩滑,回味无穷。喝一口豆沫,仿佛饮一壶醉人的美酒,满嘴留香。

位于城垣南路4号的老字号亚平豆沫店,做豆沫已做了三代,至今生意十分红火。

汝州民谣:

骑着自行车儿,上街喝豆沫儿;  
连喝两大碗儿,一碗不咋着儿!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发,沿广成路东行,至城垣路右转,直行至中大街牌坊,即到东关桥头亚平豆沫店。

转自《汝滋味》 汝州市史志办公室供稿

## 李氏唢呐



唢呐,古代波斯语Sumā的译音,大约在南北朝时(公元300年)由中亚传入中国,在开元时期传到中原地区,中原人多称其为“大笛”“喇叭”。笙竽属于吹奏乐器。唢呐的传入使用让古老的笙竽大大提高了表现力和感染力;笙竽不断改进的和声能力也使唢呐表现力大为提高,应用领域大为扩展。唢呐与笙竽的配合运用就如鸾凤和鸣,天造一双,仅仅运用唢呐和笙就能吹奏出优美的旋律。

明代后期以来,唢呐已在戏曲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用以伴奏唱腔、吹奏过场曲牌等,故此得以广泛流行。1988年10月,纸坊镇李氏唢呐班获得河南省首届艺术节唢呐大赛团体总分第一名,李秀红被授予“唢呐状元”荣誉称号。汝州唢呐表演也活跃在周边各县和洛阳、平顶山、许昌等城市。李氏“唢呐世家”第四代传承人李聚敏既是掌门人,又是唢呐、笙竽、萨克斯等乐器的演奏师。

2016年“李氏唢呐”被汝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汝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聚敏、李聚山、李好亚。

刚鑫雨 杜宏伟

汝州·非遗

·连载·



还有,习近平同志勇于担当,有高度的责任心,这是他做好工作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也是现在领导干部都应该具备的品质。

我在中组部工作期间,接触过的各个层次的领导干部很多,个别地方上的“一把手”没有什么责任担当,他们不是干工作,而是应付工作,上面怎么说,他们就照猫画虎,很多工作流于形式。极个别干部品质更恶劣,不仅平日“懒政”,有了重大突发事件,他们不能挺身而出站在老百姓前面,而是自己先跑了。我在湖南某地待过一段时间,那个地方发了水灾,当地“一把手”和纪委书记竟然第一时间跑掉了。这样的官员,即使不贪污、不受贿,吃老百姓的粮食也是

一种浪费。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这个地区有一次遭受了强台风侵袭,他不仅没有躲闪,而且在第一时间冲到前线去指挥战斗,和救灾的人民子弟兵、受灾的老百姓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那一次,我正好在福建调研,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

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见了很多过去一起共事的人、熟悉的人,都向他们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能走到今天,既是党组织对我的培养,也是你们大家对我的帮助。但是,今后任何人都不能以我的名义,打我的旗号干私事。同时,他给家里人“约法三章”,明确提出不能以跟他的关系为借

口,来办自己的事。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他的父亲——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同志对他的严格要求。您对习老比较熟悉,请您讲讲家庭对习近平同志的影响。

何载:家庭对习近平同志的影响,肯定是有,而且是很大的。但家庭教育具体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我虽然当年在西北局工作过,但毕竟不是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不那么直接,不好去推测。我倒可以从习近平同志和他父亲习仲勋同志有什么共同之处这样一个角度来简单谈一谈。

第一点,他们都热爱人民,注重走群众路线。(未完待续)